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刊物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藏学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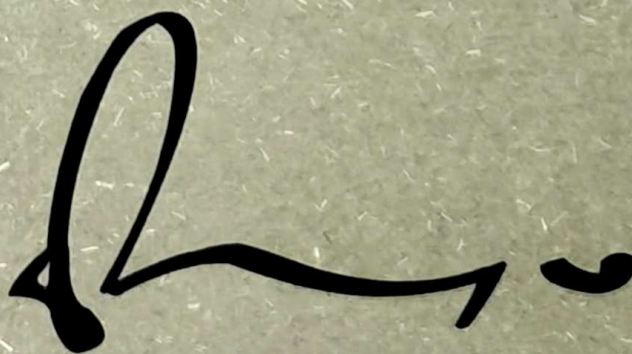
བོད་རིག་པའི་དུས་དབང།

JOURNAL OF
TIBETOLOGY

总第 25 辑

2021 (2)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བོད་རིག་པའི་རྩལ་དེབ།
藏 学 学 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主编 霍巍 石硕
常务副主编 张长虹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拼音为序)

主席 巴桑旺堆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委员 才让太 (中央民族大学)

霍 巍 (四川大学)

石 硕 (四川大学)

沈卫荣 (清华大学)

熊文彬 (四川大学)

张 云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多吉旺秋 (德国汉堡大学)

范德康 (美国哈佛大学)

马休·凯普斯坦 (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美国芝加哥大学)

滕华睿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谢 萧 (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编辑 陈 波 嘎尔让 华青道尔杰 (张延清)

许渊钦 杨清凡 玉珠措姆 (金红梅)

张长虹

编务 孙昭亮

བོད་རིག་པའི་རྒྱུ་རྗེ
藏 学 学 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Editors-in-chief Huo Wei, Shi Shuo
Deputy Editor-in-chief Zhang Changhong

Editorial Board Pasang Wangdu (*Chair, Tibet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ina*)
Tsering Thar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Huo Wei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Shi Shuo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Shen Weirong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Xiong Wenbin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Zhang Yun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Dorji Wangchuk (*Hamburg University, Germany*)
van der Kuijp, Leonard W. J. (*Harvard University, U.S.A.*)
Kapstein, Matthew T.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Fra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Tuttle, Gray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Scherrer-Schaub, Cristina A.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France*)

Editors Chen Bo, Gaerrang,
Pelchan Dorje (*Zhang Yanqing*),
Xu Yuanqin, Yang Qingfan,
Yudru Tsomu (*Jin Hongmei*), Zhang Changhong

Editorial Assistant Sun Zhaoliang

论格鲁派在古格地区的发展及弘传^{*}

黄博

内容摘要：15 世纪初格鲁派在卫藏地区形成后很快就传入了古格境内，一方面古格的寺院大多改宗了格鲁派；另一方面，格鲁派在古格王室贵族的支持下也兴建了不少新的寺院，逐渐形成了格鲁派在古格境内的寺院体系。格鲁派本身有着发达的寺院教育，格鲁派传入古格后，建立起了古格的僧人到卫藏主寺学经的制度，并且在卫藏主寺中开办专为阿里地区僧人学经的扎仓，为古格培养了大量的佛教人才。同时，古格王室与格鲁派上层之间有着密切而良好的关系，古格王多次试图迎请达赖喇嘛与班禅大师来传法，古格王也曾去卫藏地区拜见达赖喇嘛，其高潮就是古格末年迎请四世班禅大师到访古格。古格与格鲁派长达两百多年的政教关系，早已在深层结构上让卫藏和阿里形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古格是 10-17 世纪统治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在其统治的后期，格鲁派在卫藏地区兴起并迅速西传到阿里地区。格鲁派从 15 世纪初开始传入古格后，逐渐在其境内拥有了包括著名的托林寺在内的众多寺院，建立起了古格僧人前往卫藏大寺的学经机制，为古格及西部西藏地区培养了一大批的佛学人才；古格王室更是持续支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代西藏阿里地区政治地理研究”（19FZSB061）的阶段性成果。

持格鲁派在西部地区的发展壮大，与格鲁派上层领导集团有着非常频繁的联系和深入的交往，对后世西藏的宗教结构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格鲁派与古格的关系，目前学界尚缺乏整体和系统梳理¹，因此本文运用相关藏文史料，在历史考证的基础上，尝试再现格鲁派与古格关系的历史过程和完整图景。

一、古格境内格鲁派寺院体系的形成

格鲁派在古格的基本力量和经济基础是建立在遍布古格全境的格鲁派寺院的基础上的，格鲁派在古格的寺院体系的形成，是格鲁派在古格传播的重要成就之一。古格境内格鲁派寺院体系的构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古格境内旧有寺院在格鲁派传入后大量地改宗了格鲁派；二是格鲁派高僧在古格王室和信众的支持下，修建了一些由格鲁派主持的新寺院，这些寺院也自然成为格鲁派的道场。

15 世纪初，宗喀巴的亲传弟子阿旺扎巴（ངག་དབང་གཤགས་པ）回到古格传播格鲁派的教法，很快就赢得包括古格王南杰德（ནམ་རྒྱལ་ལྷེ། 1372-1439 年）在内的古格王室的青睐，依靠王室贵族的支持，他逐渐掌握了古格境内许多重要寺院的控制权，这些寺院就自然地改宗了格鲁派²。阿旺扎巴在王室贵族的支持下成为托林寺（མཚོ་ལྷོང་།）和洛当寺（ལྷོང་ལྷོང་།）的座主（གདན་ས་）。托林寺始建于 996 年，是古格历史最悠久和宗教地位最高的寺院，著名的拉喇嘛益西沃、大译师仁钦桑布都曾经驻锡此寺。洛当寺的历史虽然不如托林寺悠久，但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位于宫城附近洛地方的高地上，与王室关系密切。差不多同时，阿旺扎巴也成为芒囊寺（མ་ནང་བྱང་ཆུབ་སྤྱིང་།）的座主，芒囊寺是跟托林寺一样古老的名寺，由早期古格王拉喇嘛绛曲沃所修建，阿底峡大师被邀请到古格后曾一度驻锡此寺³。上述这些重要寺院因为阿旺扎巴长期主持，都转变成为格鲁派的寺院。另外，阿

1 目前集中论述这一问题主题的专题论文只有 Lobsang Shastri 对包括古格在内的西藏阿里地区的各君主与格鲁派关系的研究；此外，黄博对格鲁派在 15 世纪初传入古格的情况也有所考察；伯戴克在《拉达克王国史》、维大利在《古格普兰王国》中也涉及到古格王室与格鲁派高僧交往的考证。参见 Lobsang Shastri, "Relations between Dalai Lamas and Rulers of mNga' ris skor gsum: From late 14th-mid 19th century." *Tibet Journal* 2003 (3): 3-116；黄博：《改宗格鲁：元明之际西藏古格王国政教关系的演进》，《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6（1）：104-112；[意] 毕达克著，沈卫荣译：《拉达克王国史（950-184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27-55；Roberto Vitali, *The Kingdoms of Gu.ge Pu.hrang*, New Delhi: Indraprastha press, 1996: 503-528.

2 参见黄博：《改宗格鲁：元明之际西藏古格王国政教关系的演进》，《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6（1）：109-112。

3 ལྷོང་ལྷོང་ལྷོང་གྱི་མཚོ་ལྷོང་གི་ལྷོང་ལྷོང་གི་ལྷོང་ལྷོང་། ལྷོང་ལྷོང་གི་ལྷོང་ལྷོང་། 1998: 274-275；汉译文参见第斯·桑结嘉措著，索南才让译：《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21：274-276。

旺扎巴的弟子们也不遗余力地扩大格鲁派在古格的寺院基础，如将切嘎尔的南杰孜寺（ཕྱེདཀར་དུ་ཚོས་ལྷོ་རྩམ་རྒྱལ་ཅེ）改宗格鲁派，切嘎尔位于今阿里地区札达县的萨让乡，距托林寺约 80 多公里⁴，阿旺扎巴的弟子扎巴桑波（གྲགས་པ་བཟང་པོ）在主持南杰孜寺期间，使这座原本属于止贡派的寺院改宗了格鲁派⁵。

另一方面，从 15 世纪开始到 17 世纪的两百年间，格鲁派高僧在古格王室和信众的支持下新修了一批寺院，这些寺院也成为格鲁派在古格的基本力量。15 世纪初，古格王南杰德在位期间，在古格北方的政教中心东嘎创建了著名的扎西曲林寺（བཀྲ་ཤིས་ཚོས་སྤྲིང），此寺的旧址据说是一个叫做“天神之花”（ལྷའི་མེ་ཉེག）的贵族女性长期供养三十位清静比丘的供奉处，并以弘扬佛教为宗旨，相传了数代，可能早先已有佛寺的雏形，扎西曲林寺建成后，南杰德将该寺奉献给了阿旺扎巴，这座新建成的寺院遂成了格鲁派在古格北方的重要基地⁶。《阿里王统记》记载了著名的拉喇嘛益西沃有一个名叫“天神之花”的女儿⁷，这座寺院的旧址应当是她所兴建的。扎西曲林寺建成后一度十分繁荣，现在虽已废弃多年，但从其遗址中仍可看出当年的辉煌，寺址位于札达县治以北的东嘎村北面的山顶上，主体建筑为“红庙”，总面积达 12000 平方米，由门廊、正殿和后室三部分组成，内有大量精美的壁画和塑像⁸。

1424 年，古格王南杰德退出家为僧，王子南喀旺波彭措德（ནམ་མཁའི་དབང་པོ་ཡུན་ཚོགས་ལྷེ། 1424-1449 年在位）即位后，继续保持了对格鲁派的热情⁹，这期间一班班禅克珠杰（མཁའ་གྲུབ་རྗེ་དགེ་ལེགས་དཔལ་བཟང་། 1385-1438 年）的亲传弟子、大成就者官觉贝衮（དགོན་ཙོག་དཔལ་མགོན）很可能就是在这时来到古格传扬格鲁派的教法，官觉贝衮在多香（རྫོགས་ཤང）

4 གུ་གེ་ཚོ་རིང་རྒྱལ་པོ། མངའ་རིས་ཚོས་འབྲུང་གངས་ལྗོངས་མཛེས་རྒྱན། ལྷ་ས། བོད་ལྗོངས་མི་དམངས་སྐྱེད་ཁང་། 2006: 334。

5 དགའ་ལྷན་ཚོས་འབྲུང་བེད་རྒྱ་ལེར་པོ། 1998: 275；汉译文参见《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2021：276。关于南杰孜寺，《松巴佛教史》的说法也大致相同，参见松巴堪布·益西班觉著，蒲文成、才让译：《松巴佛教史》，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328。

6 དགའ་ལྷན་ཚོས་འབྲུང་བེད་རྒྱ་ལེར་པོ། 1998: 277；汉译文参见《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2021：278。另见《松巴佛教史》，2012：328。

7 གུ་གེ་མཁའ་ཚེན་དག་དབང་གྲགས་པ། མངའ་རིས་རྒྱལ་རབས། རོ་ལིང་གཙུག་ལག་ཁང་ལོ་གཅིག་ལྗོངས་འཁོར་བའི་རྗེས་དྲན་མཛད་སྤོང་གོ་སྤྲིན་ཚོགས་ཚུང་། 1996: 51。

8 索朗旺堆主编：《阿里地区文物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111-113。

9 需要注意的是，古格王室对藏传佛教各教派的支持并不是排他性的，南喀旺波彭措德在支持格鲁派的同时，对萨迦派也倾注了大量的精力。1436 年前后萨迦派高僧俄钦·贡噶桑波曾应古格王室的邀请前往普兰传法，并在科迦寺主持了南喀旺波彭措德的出家仪式。同一时期古格本地也有承事萨迦派的高僧，如《拉喇嘛益西沃广传》的作者扎巴坚赞即曾先后就学于俄钦和萨迦派的另一位高僧绒敦·释迦坚赞，他回到古格后驻锡托林寺，传授萨迦派的教法。参见黄博：《10—13 世纪古格王国政治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28-29。

地方修建了木嘎尔却宗寺（ལུ་དཀར་ཚོས་ཚོང），并担任第一任座主¹⁰。该寺位于今札达县扎布让乡的布林村，离托林寺约 25 公里¹¹，也是著名的多香城堡遗址所在地，现存的多香城堡中尚有不少残存的佛殿和佛塔，分布在遗址南区的山脚下的山坡和台地上，尽管大部分的外观建筑都已经被损毁掉了，但杜康大殿和贡康大殿尚保存完好，杜康大殿中尚有一些壁画，包括高僧像、十方如来佛大像、胜乐金刚等，贡康大殿中有多种怙主像和六道轮回“三恶道”中的畜生道图¹²，这个佛寺遗址的规模不小，而且规划严整，可能就是木嘎尔却宗寺的残余建筑。同时，南喀旺波彭措德在位时，还有一个叫做益西尊追的河西圣者（ཉ་སེ་འཕགས་པ་ཡེ་ཤེས་བཙོན）¹³来到古格首都扎布让创建了哲丹寺（ཤི་ལྷན），此寺也是属于格鲁派系统的寺院¹⁴。不过另据《松巴佛教史》的说法，河西圣者·益西尊追是著名的古格王拉喇嘛益西沃的上师，哲丹寺最初是益西尊追所建，南喀旺波彭措又再次复建，洛桑饶丹（ལྷོ་བཟང་རབ་བཏན）时期才改宗为格鲁派的寺院，此说或更得哲丹寺的实情¹⁵。古格王室还一直持续地对格鲁派的寺院进行翻新和扩建，15 世纪晚期在位的古格王洛桑饶丹的王后顿珠玛（དོན་གུབ་མ）也是一位格鲁派的热情支持者，她主持修建了洛当寺的红殿。《黄琉璃》记载，洛桑饶丹的王后顿珠玛修建了面积为三十根柱子的红殿，打造了无比成就自在佛、弥勒佛、三怙主、宗喀巴师徒的身像，此外还刻印了许多佛经¹⁶。

因此南喀旺波彭措德统治时期，格鲁派在古格的寺院势力已经初具规模，仅阿旺扎巴亲自主持的寺院就有托林寺、洛当寺、芒囊寺和扎西曲林寺，另外还有官觉贝衮的木嘎尔却宗寺和河西圣者的哲丹寺，格鲁派在古格的寺院布局基本形成。但格鲁派的寺院体系的扩展仍然在继续，16 世纪前半期，古格王济登旺秋班噶尔德（འཇིག་རྟེན་དབང་ཕྱག་པང་དཀར་ལྷེ）即位后，与他的两个兄弟绛央巴（འཇམ་མཁའ་དབྱངས་པ）和恰多尔（ཕྱག་རྗེར）一起将洛当寺进行扩建，修建了寺中的白殿和大威德殿¹⁷。此外，济登旺秋班噶尔德时代，在古格

10 དགའ་ལྷན་ཚོས་འབྲུང་བེད་རྒྱ་ལེར་པོ། 1998: 276；汉译文参见《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2021：276-277。另见《松巴佛教史》，2012：328。

11 མངའ་རིས་ཚོས་འབྲུང་གངས་ཚོངས་མཛོས་རྒྱན། 2006: 196。

12 《阿里地区文物志》，1993：94-95。

13 古格王室的护法神之一即名“河西圣者”，古格与河西可能存在的历史联系，参见黄博：《从古格“哈奢帕巴”崇拜看中古时期河西与藏西的交流》，《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20（1）：79-85。

14 དགའ་ལྷན་ཚོས་འབྲུང་བེད་རྒྱ་ལེར་པོ། 1998: 273-274；汉译文参见《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2021：274。

15 《松巴佛教史》，2012：327。

16 དགའ་ལྷན་ཚོས་འབྲུང་བེད་རྒྱ་ལེར་པོ། 1998: 274；汉译文参见《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2021：275。另见《松巴佛教史》，2012：327-328。

17 དགའ་ལྷན་ཚོས་འབྲུང་བེད་རྒྱ་ལེར་པོ། 1998: 274；汉译文参见《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2021：275。

王的上师（དབུ་ལྷ）勒珠贝桑（ལེས་གུབ་དཔལ་བཟང）主持下，将朗嘎寺（ལང་ཀ་ཚོས་ལྗེ）迁建到香孜官附近，该寺最初是由弥珠巴大师（མི་རྩི་པ）创建的，迁建工程完成后，勒珠贝桑给这座寺院取了一个新的名称，叫做热丹强巴林寺（རབ་བརྟན་བྱམས་པ་གླིང），勒珠贝桑本人则担任了该寺第一任座主¹⁸。香孜位于托林以北约60公里处，该地现属札达县香孜乡。在古格时代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教中心，现在考古调查发现在香孜乡治所北面的山脊上有一个庞大的古代遗址群，包括寺庙、城堡、窑洞等。寺庙主体建筑位于山脊的南坡，现存有强巴佛殿和护法神殿，殿后有佛教石窟，内壁上绘有宗喀巴师徒三尊像¹⁹。这些佛寺遗迹很可能就是古格时代的热丹强巴林寺的残余建筑，特别是强巴佛殿与热丹强巴林寺具有很强的一致性。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古格亡国前夕，格鲁派的寺院扩建仍然在进行，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当时的古格王名叫南喀旺秋（ནམ་མཁའི་དབང་ལྷག），南喀旺秋的兄弟出家为僧，成为格鲁派僧团在古格的领袖人物，名叫拉尊洛桑丹白尼沃（ལྷ་བཙུན་སློ་བཟང་བསྟན་པའི་ཉི་འོད）。洛桑丹白尼沃本人作为古格王的兄弟，身份高贵，地位显赫，可调动大量的社会资源，他领导古格的格鲁派时，仅扩建哲丹寺工程一项就已令人瞩目，《黄琉璃》详细记载了他主持哲丹寺工程扩建情况：

在哲丹寺从中到右次第建造了时轮金刚、集密、不动、文殊金刚、观自在菩萨、黑、红、威严阎罗王、不动佛、无量寿佛。在左边修建了洛、铃、黑三胜乐金刚、喜金刚、大轮明王、伏魔金刚、普明大日如来等坛城，共计佛殿十七座。在楼上建造了药师佛殿。下了每年的神变月为各仪轨的修供月，其余月则以上品举行供祭的规定。²⁰

此外，拉尊洛桑丹白尼沃同之前的王室出家者一样，也兼任着古格境内几个重要寺院的寺主，根据《黄琉璃》所记统计，当时古格最主要的几个寺院托林寺、洛当寺、达巴扎什伦布寺等都由他主持²¹。

可以说，到了古格晚期，在长期的、大规模的寺院改宗、翻新和新建的过程中，遍

18 དགའ་ལྷན་ཚོས་འབྲུང་བེན་ཅུ་ལེར་པོ། 1998: 278; 汉译文参见《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2021: 275。另见《松巴佛教史》，2012: 328。

19 《阿里地区文物志》，1993: 113-114。

20 དགའ་ལྷན་ཚོས་འབྲུང་བེན་ཅུ་ལེར་པོ། 1998: 274; 汉译文参见《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2021: 275。

21 དགའ་ལྷན་ཚོས་འབྲུང་བེན་ཅུ་ལེར་པོ། 1998: 273-276; 汉译文参见《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2021: 274-276。

布古格各地的格鲁派寺院体系已经形成。托林寺、洛当寺和哲丹寺位于古格王城附近，是古格的格鲁派寺院体系的中枢所在，其座主通常是古格最有名的高僧或最有权势的王室僧人。其他的寺院则主要分布在古格的一些重要城堡或重镇所在地。一是围绕在王城周围的寺院，如扎布让东南方向上的重镇芒囊，有绛曲林寺；扎布让西南方向的多香城堡，有木嘎尔却宗寺等；二是在朗钦藏布（象泉河）南岸的古格南部地区，以王城为中心呈东西线状分布，往东在扎布让东南方不远处的达巴，有仿照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修建的达巴扎什伦布寺；往西在扎布让的西北方、朗钦藏布的南岸的萨让地方，有南杰孜寺等。三是在朗钦藏布以北的古格北部地区，位于朗钦藏布各个支流的河谷深处地带，如扎布让以北稍偏东的东嘎，有扎西曲林寺；扎布让以北稍偏西的香孜有热丹强巴林寺等。显而易见，格鲁派寺院在古格的核心地区的布局是相当完备的²²。

二、格鲁派的寺院教育体系与古格地区佛教人才的培养

格鲁派在古格的弘传和发展的模式与藏传佛教其他的教派颇为不同，此前止贡派和蔡巴派在古格的发展模式是从卫藏地区派遣僧团进入古格，两派虽然也取得了相当丰富的传教成果，但对古格本地的佛教人才的培养和本地僧团的发展助益不大²³。但格鲁派在古格的发展并非是单向传播式的，而是有着双向的宗教文化交流。首先，格鲁派最初进入阿里地区传教的阿旺扎巴就是古格人，他的家乡在古格的噶林，该地属于朗钦藏布河南岸的古格核心区。他跟随宗喀巴大师，获得“边地护教亲炙弟子”（དངོས་སྐྱོབ་བཟུན་པ་ཕྱོགས་མཐར་ལྗོངས་བ་བྱུག）的称号，回到古格后先在东嘎一带传布格鲁派的教法，之后使古格王室皈依了格鲁派，出任包括托林寺、洛当寺在内的多个重要寺院的座主，在1424年古格王南杰德的退位大典上，阿旺扎巴已经拥有了赞誉大学者的“智者之王”（མཁས་པའི་དབང་པོ། 意为“古格的首席大学者”）的美称，整个15世纪，阿旺扎巴都是古格最有影响力的格鲁派高僧²⁴。

格鲁派的兴起，大大提高了古格人在藏传佛教历史中的参与度，这一时期格鲁派

22 关于古格境内重要城堡和村镇的情况可参见黄博：《古格时期西藏阿里地区的重要城堡与村镇略考》，沈卫荣等主编：《西藏宗谱：纪念古格·次仁加布藏学研究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8：637-647。

23 止贡派和蔡巴派在古格的活跃时期主要是13世纪前后，详情参见黄博：《生命之树：西藏阿里王朝与止贡噶举派早期政教关系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2（6）：168-177；《宣文辅治：元朝统一西藏前后阿里地区的政教关系研究》，《藏学学刊》第18辑，2018：55-74。

24 参见黄博：《改宗格鲁：元明之际西藏古格王国政教关系的演进》，《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6（1）：109-112。

中除了阿旺扎巴之外，还有一位出生于古格的名叫却旺扎巴（ཚས་དབང་གཤམ་པ། 1404-1471年）的著名高僧，不过他学成之后没有回到家乡，而是去了康区，为格鲁派在康区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据《黄琉璃》记载，却旺扎巴于阳木猴年（1404年）生于阿里古格象雄之地，他从年轻时起就崇信佛法，聪明伶俐，来到佛法生起之地的卫藏地区，进入文殊怙主法王宗喀巴的大宝教门，依止法王师徒父子的莲足，勤奋钻研显密一切经典，成为一名大学者。他与木色巴（ལུ་སྒྲ་པ།）一起被誉为宗喀巴弟子中智慧最殊胜者。他一生创作了大量才思极佳、文辞优美的诗歌。他在卫藏学法大成之后前往康区，在昌都一带弘扬格鲁派的教法，随后担任格鲁派在康区的主寺昌都强巴林寺的第二任主持，做了许多利益佛教的事业。此外他自己也创建了一些寺院，其中最著名的是在那雪建立的布达南杰贝巴寺（ནགས་ཤོད་སྤུས་མཛའ་རྣམ་རྒྱལ་དཔལ་འབར།），他于68岁时在该寺圆寂²⁵。

到16世纪，在古格王室的支持下，逐渐建立起了古格本地僧人同格鲁派的卫藏地区主寺之间的佛教人才寺院教育体系。1541年，古格王济登旺秋班噶尔德提供巨资，由二世达赖喇嘛主持在曲科杰寺（ཚས་འཁོར་རྒྱལ།）创建了专门供阿里僧人学法的“阿里扎仓”，《黄琉璃》一书对此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曲科杰寺的）第三扎仓阿里扎仓，在杰喇嘛的转世——班钦根敦嘉措六十六岁时，阿里法王济登旺秋班噶尔德和大臣阿旺南杰奉献了许多珍宝财物以及多如鹅群的僧人在曲科杰寺创建了这一扎仓，因此而得名，且有附属庄园。²⁶

曲科杰寺为二世达赖喇嘛在1509年创建的一所格鲁派的重要寺院，位于今山南地区的加查县北部的崔久乡。古格政府出资捐建阿里扎仓，不但使古格政权同格鲁派总部建立起正式的政教合作关系，还为阿里地区的各大寺院的僧人们提供了一个到卫藏地区求习佛法的学习基地，该扎仓此后基本上与阿里地区各大寺院结成固定的生源供应关系，由各大寺院提供优秀人才到阿里扎仓深造，因而曲科杰寺的阿里扎仓为古格和阿里地区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佛教人才，对阿里地区佛教水平的提高贡献极大，济登旺秋班噶尔德此举可谓功德无量。

值得特别注意的正是，格鲁派在阿里地区的传教方式与以前各教派的不同也在于

25 དགའ་ལྷན་ཚས་འབྱུང་བེད་ལྷན་ལེན་པོ། 1998: 331; 汉译文参见《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2021: 341。

26 དགའ་ལྷན་ཚས་འབྱུང་བེད་ལྷན་ལེན་པོ། 1998: 198; 汉译文参见《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2021: 187。

此，即不是仅仅将本派的人才和教团派驻阿里，而是培养阿里本地人才主持当地的教务，同时阿里本地人也有了固定的机会到卫藏大寺学习，而成为格鲁派的高僧，曲科杰寺的阿里扎仓是格鲁派设立的最大的阿里学院²⁷。阿里扎仓建成后二世达赖喇嘛委任自己的弟子持藏者丹巴达桑（ལྷོ་སྡོད་འཛིན་པ་བསྟན་པ་དར་བཟང་）为阿里扎仓的首任主持，由于扎仓的教学对象主要面向古格所在的阿里地区的僧人，所以后来又有不少出生于阿里的僧人担任扎仓的主持，据记载先后主持阿里扎仓的阿里人有扎西贝桑（བཀྲ་ཤིས་དཔལ་བཟང་）、饶绛巴丹巴嘉措（རབ་འབྲམས་པ་བསྟན་པ་རྒྱ་མཚོ་），古格人洛追嘉措（སློ་གྲོས་རྒྱ་མཚོ་）、尊追坚参（བརྩོན་འགྲམས་རྒྱལ་མཚན་）、芒域人喇嘛桑结贝桑（སངས་རྒྱས་དཔལ་བཟང་），毕底人贝丹坚参（དཔལ་ལྷན་རྒྱལ་མཚན་）、松热嘉措（གསུང་རབ་རྒྱ་མཚོ་）、洛桑南杰（སློ་བཟང་རྣམ་རྒྱལ་），可谓人才辈出²⁸。

除了曲科杰寺的阿里扎仓之外，在其他的一些大寺中，也有一些小型的专供阿里僧人学习的单位，比如色拉寺虽然没有阿里扎仓，但在扎仓之下却有一些专门供阿里僧人学经的康村，如杰巴阔孟扎仓中就设有阿里古格、阿里白图、阿里桑噶尔和阿里达摩四个康村²⁹；扎什伦布寺的吉康扎仓也有古格、白图、达摩和达巴等几个米村专供阿里僧人学经³⁰。因此格鲁派中有不少高僧都出自古格地区，除了前面提到的跟阿旺扎巴齐名的却旺扎巴之外，古格人中后来还出现过一个甘丹赤巴，即第四十任甘丹寺法台贝丹坚赞（དཔལ་ལྷན་རྒྱལ་མཚན་），巧的是此人正是曲科杰寺阿里扎仓培养出来的高材生。

贝丹坚赞，出生于古格附近的毕底章卡尔（སྤྱི་ཉི་གང་མཁར་）地方，后来到拉萨学法，又到曲科杰寺的阿里扎仓和下密院研习各种显密经论，后来成为甘丹寺绛孜扎仓的堪布，最后登上了至尊宗喀巴大师的金座，担任了七年的甘丹寺法台。他在任的时间大约在1651-1657年之间，此时古格已经亡国多年，他卸任之后驻锡俄噶尔寺（མངོན་དགའ་），经常游历各大名寺，直到七十三岁时圆寂³¹。由于甘丹寺是格鲁派的主寺，建成后由宗喀巴大师担任该寺的第一任法台，所以甘丹赤巴一向被视为本派的教主，在任职资格上重学问而不问出身，其宗教地位极高，出行时有人开道，仪仗中有香炉、黄伞，在

27 此前大规模往阿里地区传法的止贡派曾在阿里的神山圣湖地区大力经营，13世纪以后形成以冈底斯山中的远声寺为基地，以止贡多增为首领的止贡派僧团。但止贡派不像格鲁派那样有着严密的修学体系，神山圣湖地区的止贡僧团及其领导者多从卫藏地区派出，其著名高僧如聂钦波·杰瓦拉囊巴、古雅冈巴、止贡林巴京俄·喜绕迥乃等，皆非来自卫藏地区，阿里本地僧人的影响力并不显著。参见黄博：《生命之树：西藏阿里王朝与止贡噶举派早期政教关系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2（6）：168-177。

28 དགའ་ལྷན་ཚོས་འབྲུང་བེད་ཅུ་ལེར་པོ། 1998: 198-199; 汉译文参见《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2021: 187。

29 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8: 565。

30 《西藏通史——松石宝串》，2008: 573。

31 དགའ་ལྷན་ཚོས་འབྲུང་བེད་ཅུ་ལེར་པོ། 1998: 92; 汉译文参见《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2021: 75。

甘丹颇章政府时期，这一待遇与达赖、班禅和萨迦法王一致³²，可见贝丹坚赞确实佛学知识精湛，佛教修为高深。此外，其他一些小有成就的阿里僧人在《黄琉璃》中更是不计其数了。

随着格鲁派在古格的进一步发展，16世纪时，格鲁派已经在古格取得了超越其他教派的优势地位。《新红史》在叙述古格的教派情况时说，“古格之贝拉赞普也唯只供奉格丹派，并以财物表示敬爱。让其属下之诸如萨迦巴寺院处于自然状态”。³³《新红史》成书于1538年，这段材料的描述正可以说明十五世纪前半期格鲁派在古格的一枝独秀。因此，16世纪以来，古格本地的高僧基本上都是格鲁派寺的寺院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如古格王济登旺秋班噶尔德统治时期，古格的宗教领袖是前文已经提到过的修建达巴扎什伦布寺的欣达巴，此人是16世纪格鲁派在古格成就最大的高僧，全名叫班钦欣达巴·洛追坚赞（པཎ་ཆེན་ཤར་གླིང་པ་སྒོ་སྤོང་གྲུ་མཚན་པ་），因为佛学修为深湛，所以人称班钦，意即大学者。

欣达巴出生于古格北部的东嘎地区，宗教史著作通常认为他拥有许多神奇能力，据说曾使托林寺的强巴佛像开口说话，曾发掘出宝藏（可能指藏传佛教中的伏藏），在西藏有许多关于他的奇异事迹流传³⁴。欣达巴早年在卫藏地区学法，成就极大，在回古格创建达巴扎什伦布寺之前，曾经做过著名的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第七任法台。欣达巴拥有“班钦”的名号，他本人具有精深的佛学造诣，著有《中观释义明论》和《般若明义》等讲释经论的专著，这两本书后来成为吉康扎仓必须讲授的经典教材³⁵。他卸任扎什伦布寺法台之位后回到了家乡古格，在托林以南60公里的达巴地方创建了达巴扎什伦布寺（མདའ་པ་སར་བཀྲ་ཤིས་རྒྱུ་ཤོ་པོ་），并担任该寺的第一任主持³⁶。同时，跟阿旺扎巴一样，他主持着古格境内大多数重要寺庙的教务，事实上是古格国内得到普遍认同的宗教领袖和古格境内格鲁派寺院集团最高领导人。从《黄琉璃》中可以统计出这一时期他至少担任着托林寺、洛当寺、达巴扎什伦布寺、东嘎扎西曲林寺、香孜热丹强巴林寺等古格的重要寺庙的座主之职³⁷。

除此之外，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的第六任寺主也是古格王室中的出家者，此人名叫

32 王维强：《甘丹赤巴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中国藏学》2006（2）：217-218。

33 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新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27-28。

34 དགའ་ལྷན་ཚོས་འབྲུང་བེད་ཀྱི་ལེན་པོ། 1998: 276; 汉译文参见《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2021：276。

35 དགའ་ལྷན་ཚོས་འབྲུང་བེད་ཀྱི་ལེན་པོ། 1998: 242; 汉译文参见《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2021：242-243。

36 དགའ་ལྷན་ཚོས་འབྲུང་བེད་ཀྱི་ལེན་པོ། 1998: 276; 汉译文参见《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2021：276。

37 དགའ་ལྷན་ཚོས་འབྲུང་བེད་ཀྱི་ལེན་པོ། 1998: 273-278; 汉译文参见《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2021：274-278。

阿里拉尊·洛桑丹贝尼玛坚赞 (མངལ་རིས་ལྷ་བཙུན་སློབ་ཐོས་བསྟན་པའི་ཉི་མ་རྒྱལ་མཚན)³⁸，古格高僧欣达巴就与拉尊洛桑丹贝尼玛坚赞同属古格人，在扎什伦布寺学经期间，欣达巴肯定得到这位同乡前辈的不少关照，后来欣达巴接替拉尊洛桑丹贝尼玛坚赞担任了扎什伦布寺第七任法台之外，而在此之前还接替担任过吉康扎仓 (དབྱིལ་ཁང་གྲུ་ཚང་) 的洛本 (སློབ་དཔོན)³⁹。不过关于拉尊·洛桑丹贝尼玛坚担任扎什伦布寺寺主的相关资料实在太少，他的身份按当时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古格王族中的远支成员，他是接替二世达赖喇嘛担任扎什伦布寺主持的，而二世达赖喇嘛是在 1516 辞去主持之职，然后离开扎什伦布寺前往拉萨担任哲蚌寺的法台，据二世达赖喇嘛自述，他离开扎什伦布寺前曾召集寺中上层讨论本寺继任主持的人选问题：

于是我们商议委任扎什伦布寺法座的继承人问题。卜算是到外面去找，还是在寺内的三个扎仓的堪布中选择合适的人选为好。考虑的结果是在寺院内部任命为好。由于其他的两位堪布表示不愿意担任法台，结果一致同意委任曲杰拉尊洛桑丹巴担任法台。⁴⁰

看来拉尊洛桑丹贝尼玛坚赞得以担任扎什伦布寺的法台是得到寺内僧众的一致支持的，而他本人在此前已在寺中修行多年，并且担任着寺内扎仓主持的职务。幸运的是，他担任扎仓堪布的情况可用《黄琉璃》的记载加以补充。桑结嘉措告诉我们，他在登上扎什伦布寺的法座之前曾做过第二扎仓吉康扎仓的洛本，在任期间出资为千尊佛像涂金⁴¹，出手如此阔绰，这倒是与他王室贵族的身份相符。

古格王室有王位继承人之外的王室成员出家为僧的传统，比如当时的古格王济登旺秋班噶尔德有两个儿子，之后阿吉旺秋即位为王，另一个儿子则出家为僧，是为拉尊喜饶沃色 (ཤེས་རབ་འདེམས་ལེན)。从《黄琉璃》的记载可知，拉尊喜饶沃色也是身兼数寺之主，至少担任着洛当寺、南杰孜寺、多香木噶尔却宗寺、香孜热丹强巴林寺等几个重要寺院的主持之职⁴²。随着格鲁派在古格的兴盛，古格的王室僧人们大多接受了格鲁派的教法，

38 དགལ་ལྷན་ཚོས་འབྲུང་བེན་ཅུ་ལེར་པོ། 1998: 240; 汉译文参见《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2021: 242。

39 དགལ་ལྷན་ཚོས་འབྲུང་བེན་ཅུ་ལེར་པོ། 1998: 242; 汉译文参见《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2021: 243。

40 根敦嘉措著、陈庆英译：《二世达赖喇嘛传》，收入《一世—四世达赖喇嘛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119。

41 དགལ་ལྷན་ཚོས་འབྲུང་བེན་ཅུ་ལེར་པོ། 1998: 241; 汉译文参见《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2021: 243。

42 དགལ་ལྷན་ཚོས་འབྲུང་བེན་ཅུ་ལེར་པོ། 1998: 275-278; 汉译文参见《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2021: 276-278。

并且前往卫藏的格鲁派主寺学习，随后回到古格继续弘扬格鲁派的教法，或者留在卫藏地区为格鲁派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把古格与格鲁派的政教利益深度地联结在了一起。

三、古格王室与格鲁派上层领导集团的联系与交往

格鲁派在15世纪初传入古格后很快就得到了古格王室的尊奉，古格王室很早就打算和格鲁派在卫藏地区的上层领导集团取得直接的联系，最早试图将古格王室与格鲁派上层领导集团建立起直接联系的是古格王南喀旺波彭措德。南喀旺波彭措德即位后，曾经试图邀请克珠杰·格勒贝桑（མཁུ་བླ་མེ་རྟེན་ལེགས་དཔལ་བཟང་། 1385-1438年）来古格传法，克珠杰是宗喀巴的三大首要弟子之一，也是后世班禅转世系统所追认的一世班禅，在格鲁派集团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克珠杰在给南喀旺波彭措德的回信中以诸事丛挫，心神散逸为由，婉言谢绝了南喀旺波彭措德的邀请，虽然不能前去古格弘法，但克珠杰在信中仍不忘嘱咐说，古格王只要以佛法的慈悲心执掌王政，就能让臣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这可以说是古格王室和格鲁派上层领导集团最早的一次直接联系了，可惜的是，虽然克珠杰在信的末尾提到这封信是在三月二十七日于日沃当坚寺（རི་བོ་གཏམ་ཅན་）写成的⁴³，但是却没有说明这封信写作的具体年份。考虑到克珠杰在1431年已受贾曹杰之邀前去拉萨出任甘丹寺的法台，这封信的时间下限不会晚于1431年。而南喀旺波彭措德是在1424年才即位为古格王的，对克珠杰的邀请不会早于这一年，同时在14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克珠杰一直在江孜参与白居寺的兴建，直到1427年因为与江孜的地方首领发生矛盾，才回到日沃当坚寺，因此南喀旺波彭措德邀请克珠杰前往古格的事件应该发生在1427至1430年间⁴⁴。此外，《克珠杰全集》中还收录有克珠杰与南喀旺波彭措德的王妃赤坚（ཁྲི་ལྷ་མ）的书信⁴⁵，克珠杰还为赤坚撰写了《胜乐父母尊赞品》（བདེ་མཚོག་ཡབ་ཡུམ་ལ་བསྟོན་པའི་རབ་བྱེད་）⁴⁶，亦可见古格王室与格鲁派上层的密切关系。

由于克珠杰未能前往古格，古格王室与格鲁派上层领导集团的会面事实上在半个多

43 མཁུ་བླ་མེ་རྟེན་ལེགས་དཔལ་བཟང་། བྱ་གེའི་མངའ་བདག་ནམ་མཁའི་དབང་པོ་མན་ཚུགས་ལྷེ་དཔལ་བཟང་པོར་ལུལ་བའི་ཡིག་ལན། གངས་རྫོངས་མཁུ་བླ་མེ་རྟེན་ལེགས་དཔལ་བཟང་གི་ལུང་། མཚོ་སྔོན་མི་རིགས་དཔེ་སླུབ་ཁང་། 1988: 408-411; 另见 བྱ་གེའི་མངའ་བདག་ཁྲི་ནམ་མཁའི་དབང་པོ་ལ་སློབས་པ། གསུང་འབུམ། མཁུ་བླ་མེ་རྟེན་ལེགས་དཔལ་བཟང་། ཉ་སར་བསྐྱར་པར་བརྒྱབ་པ། འ133-136。

44 克珠杰的生平参见《西藏通史·松石宝串》，2008：548-550。

45 བྱ་གེའི་བདག་མོ་ཁྲི་ལྷ་མ་སློབས་པ། གསུང་འབུམ། མཁུ་བླ་མེ་རྟེན་ལེགས་དཔལ་བཟང་། འ136-138。

46 བདེ་མཚོག་ཡབ་ཡུམ་ལ་བསྟོན་པའི་རབ་བྱེད། གསུང་འབུམ། མཁུ་བླ་མེ་རྟེན་ལེགས་དཔལ་བཟང་། འ32-35。

世纪后才发生。1484年洛桑饶丹亲自到后藏达那（在今日喀则地区的谢通门县境内）的多吉丹寺拜见了年仅九岁的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1476-1542年），后来二世达赖喇嘛在《自传》中记载了他与古格王洛桑饶丹（སྤོ་བཟང་རབ་བཏན）相见的详情：

到我九岁时，古格地方的领主洛桑饶丹来到后藏地方。他献给我一首赞颂诗和见面礼品，赞颂诗说：“使佛法睡莲茁壮成长的，是十五的明月根敦珠巴，他已经逝往西方极乐界。这时雪域地方佛法教法，犹如紧紧闭合的睡莲花。具有慈悲的白色的光华，你是重新升起的新月亮！”我对此给他回赠了适合的一首偈颂。当时，四面护法对我这位古格领主有一些不喜欢，显现了一些护法的神通，使他明显地感觉到这一情形。他对我说四面护法要他对四面护法奉献食子，请我为此施食。虽然我以前没有从师尊那里听受过这位四面护法的随许法，此时就立即听受了，并为他做了这一项法事。⁴⁷

可见，洛桑饶丹对当时新兴的格鲁派在西藏佛教界的地位是相当看重的，对二世达赖也有很高的期许，赞许他是重新升起的新月。不过洛桑饶丹此行也并不顺利，所谓“四面护法”不高兴的故事当是二世达赖喇嘛给他的一种宗教式的暗喻或警告。这一点在另一部二世达赖喇嘛的传记《遍知一切法王根敦嘉措贝桑波传——如意树》中讲得更明白一些，在与洛桑饶丹会面时二世达赖喇嘛曾警告古格王会有生命危险，最后在回程的路上，古格王臣一行遇到了敌人，随行的一个大臣还丢掉了性命，而洛桑饶丹返回阿里后不久也逝世了⁴⁸。

洛桑饶丹的儿子帕巴拉继位后，与格鲁派的达赖喇嘛转世系统仍然保持着联系，二世达赖喇嘛的《全集》中收录了一份标明是写给古格王帕巴拉（གུ་གེ་བདག་པོ་འཕགས་པ་ལྷ）的信件，写作地点是在哲蚌寺的寝殿（དཔལ་ལྷན་འབྲས་བུངས་ཚོས་གྲུང་གི་འཇམ་མཉམས་ཁང）⁴⁹。帕巴拉是《阿

47 《二世达赖喇嘛传》，2006：96-97。

48 གཡང་པ་ཚོས་ཇི་ཚོས་ཀྱི་རྒྱལ་པོ་ཐམས་ཅད་མཁྱེན་པ་དགེ་འདུན་རྒྱ་མཚོ་དཔལ་བཟང་པོའི་ལྷོགས་པ་བརྗོད་པ་དཔག་བསམ་གྱི་ལྷན་ཤིང་། བཟ4, 载 The collected works of the second Dalai Lama Dge 'dun rgya mtsho (1475-1542), Vol.2, New Delhi: Indraprastha Press, 2006.

49 དགེ་འདུན་རྒྱ་མཚོ། ཇི་བཅུན་ཐམས་ཅད་མཁྱེན་པའི་གསུམ་འབྲུམ་ཐོང་བ་པ་ལས་ཆབ་ཤོག་སྟན་པ་གི་སྐོར་ནམས། ལེང་གཅུག་ནང་བསྟན་དཔེ་རྟང་འཚོལ་བཟུ་ཕྱོགས་སྤྱི་གཞི་ལང་གིས་བསྤིགས། རྒྱལ་དབང་དགེ་འདུན་རྒྱ་མཚོའི་གསུང་འབྲུམ་བཞུགས་སོ། འེབ་རྒྱལ་པ། བེ་ཅིང་། གྲུང་གི་འཇམ་མཉམས་ཁང་དུ་སྟན་ཁང་། 2010: 219.

的影响力。这一点在随后他邀请三世达赖喇嘛赴阿里一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1555年济登旺秋班噶尔德派遣使臣尼丹噶居孟兑到哲蚌寺，打算迎请三世达赖喇嘛到阿里驻锡：

阿里王拉赞普贡玛久典旺秀班噶德（即济登旺秋班噶尔德）和班钦欣达巴派遣尼丹噶居孟兑携带书信礼物前来请求索南嘉措为了彼方的教法众生，前去阿里。在索南嘉措前去阿里之前，他们还请求送去描绘索南嘉措事迹的画像作为替代。这也是阿里王和前辈根敦嘉措两位福田施主之时所结善缘，双方互赠书信礼品。阿里古格王还给昌卡巴活佛写了一封信，请求赐给索南嘉措的画像作为信仰供奉之依止处，并请求教导。索南嘉措说：“按普通的传记那样绘制。”当画好主尊和诞生情形的草图时，索南嘉措说：“拿来给我看看。”仔细看后又说：“像古格王这样有根器的人，要对他保密是很困难的。前辈活佛圆寂后，在两个七天中，在兜率天宫、极乐界、空行界和拂尘洲示现神变等无数秘密事迹可作为上幅绘出。”……那幅画完成以后，举行了开光仪轨，进行加持。阿里王将此画迎请而去，作为供养之物，加以供养。这是最早将索南嘉措今生的故事绘成图画。⁵⁴

这是古格第二次邀请格鲁派的上层领导集团前往古格，上一次在1430年，邀请的是一世班禅克珠杰。尽管古格王室这次邀请三世达赖喇嘛前去古格没有成功，但也反映了古格王室与达赖喇嘛转世系统的密切关系。古格王济登旺秋班噶尔德与二世达赖喇嘛保持着多年的书信往来，并且出资在二世达赖喇嘛主持的曲科杰寺创建了阿里扎仓。二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又遣使试图迎请年幼的三世达赖喇嘛前往古格，再次加强并巩固了古格王室与格鲁派三大寺中的两大主寺哲蚌寺和色拉寺系统的紧密联系。济登旺秋班噶尔德最后索取三世达赖喇嘛的画像也是为了同格鲁派上层建立起特殊的联系，这种关系使他在三世达赖喇嘛的早年创造出两个“第一”——即第一次记述三世达赖喇嘛今生的事迹和第一次将三世达赖喇嘛今生的故事绘成图画，济登旺秋班噶尔德因此成为格鲁派教法史上必须大书特书的古格君主。

到古格晚期，古格王室与格鲁派上层领导集团的关系更为密切，其高潮就是四世班禅洛桑却吉坚赞（ལྷོ་བཟང་ཚེས་ཀྱི་བྱུ་མཚན། 1570-1662年）应邀访问了古格，终于实现了古格王室多年来希望卫藏地区的格鲁派上层领导集团能够亲临古格的夙愿。据《四世班禅

⁵⁴ 《三世达赖喇嘛传》，2006：170-172。

传》所述，去年火蛇年（1617年）的夏天，古格方面派出使者去邀请四世班禅前往古格弘法传道，使者大约在第二年春天抵达扎什伦布寺，四世班禅遂应邀启程前往古格弘法⁵⁵。从1420年代后期古格王南喀旺波彭措德试图邀请一世班禅克珠杰算起，古格在差不多坚持了二百年后终于迎来了格鲁派宗教领袖的到访。四世班禅是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格鲁派最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和藏传佛教最著名的佛学大师。这一时期由于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四世达赖喇嘛年幼并早逝，四世班禅成为格鲁派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和佛学造诣最深的高僧⁵⁶。同时，1617年前后，格鲁派在卫藏地区的处境已相当困难，由于新兴的藏巴汗政权支持噶玛噶举派敌视格鲁派的立场，对卫藏地区的格鲁派采取打击和压迫的政策，四世班禅此行也是希望当格鲁派在卫藏地区的局势日益恶化的过程中，在西部地区寻求更有力的支持者。

土马年（1618年）四月二十三日，四世班禅一行抵达普兰境内的圣湖玛旁雍措，正式开启古格之行。班禅在玛旁雍措湖边停留沐浴，于次日抵达神山冈底斯山前，然后继续西行，在夏拉扎（གཤམ་ཙ）地方与止贡多增（该派驻锡在阿里地区的僧团首领）会面，然后继续西行，在五月十三日抵达象雄的白顶地方（ལའི་ལྷིང་），与古格方面前来迎接四世班禅的庞大队伍相会。古格方面前来迎接班禅的人员包括夏仲法王（ཞབས་བྱ་ཚོ་མེད་ལྷེ）、觉卧达波（རྗོ་པོ་བདག་པོ）等古格王室高层以及众多的僧俗信众⁵⁷。夏仲法王和觉卧达波可能正是《黄琉璃》中提到的主持迎请四世班禅来访的古格王室成员拉尊洛桑丹白尼玛沃和拉尊洛桑益西沃以及古格王扎西扎巴德。拉尊洛桑丹白尼玛沃为古格王济登旺秋班噶尔德之孙，他以王室贵胄身份兼托林寺、哲丹寺、洛当寺等古格最重要的寺院的座主；而拉尊洛桑益西沃则是拉尊洛桑丹白尼玛沃的侄孙，是当时的古格王南杰扎巴桑波德的叔父，他在四世班禅访问结束后就继任了托林寺的座主，并兼任哲丹寺、洛当寺、南杰孜寺、芒囊寺等大多数古格境内的格鲁派寺院的座主，显而易见，他们祖孙二人是当时古格格鲁派僧团中最有权势的人物⁵⁸。

五月十五日，班禅与古格王室一行抵达古格的佛教中心托林寺，应古格僧团领袖夏仲法王之请，四世班禅登上了大译师仁钦桑波的法座，为古格王室及僧俗信众讲经说法。然后，前往古格境内的其他一些重要寺院，如木卡尔却宗寺、芒囊绛曲林寺、达巴

55 བཏུ་ཆེན་ལོ་བཟང་ཡེ་ཤེས། བཏུ་ཆེན་ལོ་བཟང་ཚོས་བྱས་ཀྱི་རྣམ་ཐབས། ལྷ་ས། བོད་ཚོང་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སྟེན་ཁང་། 1990: 112.

56 参见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15-24；杨贵明、马吉祥编译：《藏传佛教高僧传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210-242。

57 བཏུ་ཆེན་ལོ་བཟང་ཚོས་བྱས་ཀྱི་རྣམ་ཐབས། 1990: 112-113.

58 དགའ་ལྷན་ཚོས་འབྲུང་བེད་ལྷན་ལེན་པོ། 1998: 273-276；汉译文参见《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2021：274-277。

扎什伦布寺、香孜寺热丹强巴林寺传法，并亲自为古格、芒域、日土三地的百名信众主持了近圆戒的授戒仪式，同时还授予古格的格鲁派僧团首领夏仲法王拉尊洛桑丹白尼玛沃“教主”（བསྟན་པའི་བདག་པོ། 意为古格佛教事务的总负责人）的称号。四世班禅在古格期间，拉达克王（མང་ཡུལ་རྒྱལ་པོ།）⁵⁹ 派遣使者前来邀请四世班禅去拉达克传法，同时拉达克的大批僧俗信众来到古格拜见了班禅大师，但四世班禅没有前去拉达克，而是在九月十三日从古格启行，登上返程之路，最后在十一月十三日回到扎什伦布寺⁶⁰。四世班禅到访古格可以说是格鲁派与古格关系的高潮，可是也是古格最后的辉煌，《黄琉璃》记载，在四世班禅返回扎什伦布寺十二年后，拉达克王僧格南杰就攻入了古格，俘虏了拉尊洛桑益西沃和古格王扎西扎巴，延续了七百多年的古格政权覆灭⁶¹。

四、余论

古格的灭亡，并不意味着格鲁派与古格地区关系的结束，因为古格的故地上还有着格鲁派的众多寺院和僧俗信众，但失去了古格王室的支持，格鲁派在古格本地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特别是经济上压力越来越大，如与拉达克关系密切的主巴噶举派德钦曲果寺（བདེ་ཆེན་ཚོས་འཁོར་བའི་ལུང་།）的二世雍增活佛衞噶伦珠（ཡོངས་འཛིན་ཀུན་དགའ་ལྷུན་གྲུབ། 1617-1676年）在《自传》中说，大约在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前去汉地之后，甘丹颇章政权曾派出使者前去拉达克，请求拉达克将古格王室留下来的城堡和庄园赐给当地的格鲁派寺院⁶²。另一方面，执掌了卫藏地区政教大权的格鲁派也经常性地对古格故地上的格鲁派寺院和僧众进行经济援助，如《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中记载，1668年和1672年两次派出使者前去古格故地，给当地的五十八座格鲁派寺院和三千九百多名僧人发放了茶叶和银两⁶³。此外，有意思的是，当时古格故地虽然处于拉达克的统治之下，但甘丹颇章政权仍然可以利用当地的格鲁派寺院集团的力量在古格故地活动，如五世达赖喇嘛曾派定本贝雅（ལྷིང་དཔོན་དཔལ་ལག།）前去阿里，贝雅一行人员沿途的驿站费用是由当地的格鲁派寺院提供的，特别随行的骡马也是由古格当地的格鲁派寺院喂养⁶⁴。

59 原文以“མང་ཡུལ་”指代拉达克当为字形相近之讹，正确的写法当为“མང་ཡུལ་”。

60 བསྟན་པའི་བདག་པོས་བཞུགས་ཀྱི་རྣམ་ཐང། 1990: 113-114.

61 དགའ་ལྷུན་ཚོས་འབྲུང་བེལ་ལུང་ལེན་པོ། 1998: 273; 汉译文参见《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2021: 274。

62 ཡོངས་འཛིན་དཔལ་ལག་པོས་ལོ་རྒྱུས་བཞུགས་པའི་བཞུགས་པའི་དཔལ་གཏམ། རྗེ་ཡོངས་འཛིན་ཀུན་དགའ་ལྷུན་གྲུབ་ཀྱི་བཀའ་འབྲུག། Darjeeling: Kargyud Sungrab Nyamso Khang, 1973: 221-222.

63 五世达赖喇嘛著、陈庆英译：《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下），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6，83。

64 《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下），2006：28。

可以说，格鲁派与古格之间的联系既是从古格王室与格鲁派上层僧侣集团之间自上而下，也是古格境内的广大信众与格鲁派之间自下而上的双重关系过程，因此这种关系并不会因为古格的灭亡而终结。事实上，在古格灭亡约半个世纪后，在卫藏地区新兴的由格鲁派所领导的甘丹颇章政权最终在 1680 年代击败拉达克，重新将古格故地纳入治下，在这一带设置宗谿，建置总管，将阿里与卫藏一起纳入到西藏地方政府的治理之下，从而奠定了后世西藏政治地理和中国边疆地理的基本格局⁶⁵。但卫藏与阿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一体化进程却并不是从这场战争开始，也并不是这场战争的结果。事实上，在此之前格鲁派与古格长达两百多年的政教关系，早已将卫藏和阿里地区在深层结构上形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 黄博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

65 关于古格故地的行政建置历史过程，参见黄博：《四宗六本：甘丹颇章时期西藏阿里基层政权初探》，《中国藏学》2016（2）：148-156。